

理论之后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商务印书馆

理论之后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商正 译

欣展 校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之后/[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491-0

I. 理… II. ①伊…②商… III. 社会科学-理
论研究 IV. C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621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理论之后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商正译

欣展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龙兴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491-0

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8

定价:16.00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遗忘的政治	3
第二章 理论的兴衰	24
第三章 通往后现代主义之路	41
第四章 失与得	72
第五章 真理、德性和客观性	99
第六章 道德	135
第七章 革命、基础和基要主义者	167
第八章 死亡、邪恶和非存在	200
索 引	215

前 言

此书主要为对文化理论现状感兴趣的学生和一般读者而作，但我希望对这一领域的专家们也会有用，其重要原因是它驳斥了我所认为现今正统的文化理论。我认为：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我将努力阐述其原因并提出补救的措施。

非常感谢彼得·迪尤斯(Peter Dews)对部分手稿提出的那些令人深受启发的评论。已故的赫伯特·麦凯布(Herbert McCabe)对我论证的影响随处可见，要想限定这种影响的范围是不可能的。

特里·伊格尔顿
都柏林

第一章 遗忘的政治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 威廉斯、L. 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 西克苏、F. 杰姆逊、E. 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壮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货车之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

这些思想家的许多观点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撰写意义重大的著作。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曾几何时宣布济慈使人愉快或密尔顿精神勇猛就已足够了，但这样的年代已一去不返。这并不是说整个研究计划是个可怕的错误，某个慈悲的灵魂已经吹响警哨，以便我们全部回到费迪南德·索绪尔出世以前我们所处的局面。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因

阿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而变得更为丰富、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年代。

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他们发展、增加、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的观点。那些有能之辈，构想出女权主义、结构主义，那些无能之辈，则将这些深刻见解运用于《白鲸记》或《帽中猫》*，但是新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老一代早已证明要追随他们并非易事。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然而眼下，我们还在利用历史，而且还处在自福柯和拉康坐到打字机前以来发生了剧变的世界。新的时代要求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呢？

在回答此问题前，我们得评估我们的处境。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讲话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

没什么事能比这更容易理解了。研究乳胶文学**和在肚脐上

* The Cat in the Hat, 非常流行的儿童文学丛书。——译注

** 乳胶为制造避孕套的原料，意为色情文学。——译注

挂饰件*的政治涵义就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古老的智慧格言：研究应该是快乐的。这很像撰写你那篇比较麦芽威士忌酒口味的硕士论文或者对整天躺在床上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的硕士论文。它开创了从高等智力到日常生活之间浑然一体的连贯。能一面看电视，一面撰写博士论文，自然是好事。过去，摇滚乐使你学习分心，现在它很可能是你研究的对象。学问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却属于传媒世界、购物中心、香闺密室和秦楼楚馆。这样，它们回归到日常生活——只是有可能失去批评生活的能力。

今天，研究密尔顿作品中典故的老学究们对沉浸于乱伦和电脑化女权运动的少壮激进分子大不以为然，青年才俊们则书写着对恋脚癖的感想或15-16世纪男子紧身裤下体盖片的历史，他们满腹狐疑地打量着竟敢声称简·奥斯丁比杰弗里·阿切尔更伟大的瘦骨嶙峋的老学者。一种充满激情的正统观念让位于另一种正统观念。以前，尽管你因没能看出罗伯特·赫里克诗中的转喻而被轰出学生酒吧，今天你却会因听说过转喻或赫里克被认为愚不可及。

对性欲不屑一顾特别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性别和性欲不仅是个具有紧迫政治意义的话题，也是研究的合法对象。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根据人类没有生殖器官这一不言而喻的假定而进行的，这真有意思。⁴（知识分子也表现得似乎男男女女都没有胃。就如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评论马丁·海德格尔相当高尚的观念 Dasein，

* 美国青少年在肚脐上挂饰件显示流行时尚，意指流行文化现象。——译注

“Dasein 不食人间烟火”。Dasein 其意为专属于人类的那种生存方式。)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说,每当有人粗俗地说起人的肚皮有两种需求,脑袋有一种需求时,热爱知识的人就应该仔细倾听。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中,性欲作为人类文化基石之一在学术生活中已得以确立。我们终于承认人类的生存与真理、理性有关,但至少也与幻想、欲望有涉。只不过,文化理论现今的表现就像一位独身的中年教授,不经意之间与性邂逅,正在狂热地弥补已逝的青春韶华。

文化理论的另一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值得研究。除去一些有名的例子外,传统学术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视而不见。确实,它曾经置之不理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生活本身。不久前,在某些传统派的大学里,你不能研究那些还健在的作家,这简直是教唆你在一个雾蒙蒙的夜晚,将利刃刺入他们的两肋之间。如果你所选定的小说家十分健壮,还只有 34 岁,这将对耐心的非凡考验。你当然不能研究每天都熟视无睹的东西。根据定义,那不值得研究。被认为适合文科研究的大多数项目,并不是像指甲屑或杰克·尼科尔森*那样看得见的,而是像司汤达,主权概念或是莱布尼兹的单子论的柔美、优雅,是无形的。今天,大家普遍公认,日常生活就像瓦格纳的歌剧,错综复杂、深不可测、晦涩难懂,偶尔也会单调乏味,因此显而易见值得探索。过去,看什么值得研究,通常是看研究对象是否微不足道,是否单调,是否难以理解。今天,在一些圈子里,研究对象不过是你和朋友晚

* Jack Nicholson,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译注

上所做之事。学子们过去写评论福楼拜的文章是不置臧否，毕恭毕敬。不过，一切都变了样。现在学生们对美国长篇电视连续剧《老友记》(Friends)写的评论也是不置褒贬，毕恭毕敬。

即使这样，性欲和大众文化作为合适的研究题材，已经了结了一个强大的神话。它有助于摧毁清教徒教义：严肃是一回事，乐趣是另一回事。清教徒将乐趣解为轻浮，因为他误认严肃为一本正经。乐趣不属于知识领域，因此危险而无序。根据这一观点，研究乐趣就像对香槟进行化学分析，而不是饮用这美酒。清教徒不明白乐趣和严肃在下面的意义上相连：为更多的人找到更多的生活乐趣是件严肃的事。在传统上，它通常被称为道德说教，不过，称之为“政治”演讲也未尝不可。

然而，乐趣，一个当代文化的玄妙术语，也有其局限。发现如何才能使生活更有乐趣，并不总是使人愉快。像所有的科学探索一样，它需要耐心，自我约束，无穷无尽的忍耐厌烦的能力。无论如何，把乐趣当作最高实在的享乐主义者，往往是大声喧嚷反抗的清教徒。两者通常都“性”迷心窍。两者都把真理等同于认真。老派清教徒资本主义禁止我们享受，因为一旦我们养成了享乐的品味，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进入工厂工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要不是有了他所谓的现实原则，我们就会整天躺在家里，虽然感到有点丢人，但仍干着销魂的勾当。然而，更狡诈的、消费型的资本主义，说服我们沉湎声色、寡廉鲜耻，那样我们将不仅消费更多的商品，也将把我们的自我实现等同于这种制度的生存。任何一

* 原文为 in various mild scandalous states of *jouissance* 意为手淫。——译注

个不曾纵情女色欲仙欲死之人，都会有一个称作超我的可怕恶棍夜来造访，它对这种清心寡欲的惩罚就是让他忍受痛彻心肺的内疚。不过这恶棍也因我们享乐而折磨我们。我们还不如奖罚齐收，无论如何都要开心一乐。

因此，乐趣并非天生就有腐蚀性。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乐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信条。传统的英国绅士厌恶令人苦恼的劳作，竟不愿正确地发音，因而有了贵族式含糊的发音和拖腔。亚里士多德相信，做人，如同学加泰罗尼亚语或吹风管，得通过不断训练方可达到完美，而如果英国绅士品行高尚（这他偶尔会屈尊地表现一下），他的善行就纯粹地发自内心。道德努力是商人和职员分内之事。

当世界上有一半人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每天依靠不到2美元来生活时，并非所有研习文化的学生都会无视那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阴毛史的西方式自我陶醉（Western narcissism）。确实，今天文化研究最火爆部分就是所谓的后殖民研究，此类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悲惨的状况。就像围绕性别与性欲而展开的讨论，它已经成了今日文化最宝贵的成果之一。然而这些新思想深受新生代的欢迎，这代人记不住多少震撼世界的大事，尽管责任不在他们。在所谓的反恐战争打响之前，在年轻的欧洲人看来，要对他们的孙辈讲述的最重大的事件不过是欧元的降临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守主义占上风的沉闷的几十年中，历史感不断地减弱，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想出别的办法去改变现状，那就正中当权者的下怀。未来只不过是现今无穷的重复，——或者，如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现今加上更多的选择”。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虔诚地坚持

“保持历史的真实性”，看来他们相信，1980年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古代史。可以肯定，生活在令人关注的年代并非纯粹的幸福事，能够回想起犹太人大屠杀或是经历越战也不是特别的慰藉，天真和遗忘有它们的好处。某个时候，在海德公园，每个周末你都有可能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悼念这样的乐而忘忧的日子绝无意义。回忆一部震撼世界的政治史，至少对左派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忆一部失败史。不管怎么说，一个新的吉凶未卜的世界历史阶段已经开启，甚至最与世隔绝的学问们也无法漠视它。即使这样，最具破坏作用的，至少是在抵抗资本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就是集体有效的政治行动记忆的缺失。正是这一点，歪曲了众多的当代文化观点，使它们走了样。在我们思想的中心，有一个历史漩涡，它把我们的思想拽偏了。

尽管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大部分有着坚实、装饰精美的外表，但它出生的年代并不久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的民族主义巨浪席卷全球，一个个国家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这个年轻的世界就这样匆匆建立起来。盟军在二战中的奋斗本身就是规模空前的成功合作的行为，这种合作行为在欧洲中心摧毁了罪恶的法西斯，因而也奠定了我们所认识的今天这个世界的某些基础。我们周围的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是近期通过集体革命事业才形成的，这些事业通常由饥弱者所发动，却成功地将掠夺成性的外国统治者逐出。确实，这些革命摧垮的西方帝国本身大部分是革命的产物，只不过它们是最成功的革命，是我们已经忘怀曾经发生过的革命，通常意味着他们是诞生了我们这一辈的革命。他人的

革命总是比我们自己的革命更引人注目。

但是闹革命是一回事,继续革命是另一回事。确实,对于大多数 20 世纪的最杰出的革命领袖而言,首先引发生命的原因也导致他们最终的垮台。弗拉基米尔·列宁认为正是沙皇俄国的落后才使得布尔什维克革命成为可能。俄国这个国家缺乏那种能确保公民对国家忠诚因而有助于防止政治动乱的公众社会机构,它中央集权而非权力分散,强力治国而无视多数人的意见,它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机器上,因而推翻那个政权就是一举夺取统治权,但一旦革命成功,这同样的贫穷与落后毁灭了这场革命。经济落后,强敌围困,民智未开,民众无特殊技能,没有社会组织 and 民主自治政府的传统,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尝试需要斯大林主义的铁腕手段,结果颠覆了它正在试图建设的社会主义。

9 类似的命运折磨着 20 世纪成功挣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却最无法实现,这既是悲剧又是嘲讽。确实,后殖民理论首先发轫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失败之后,它标志着第三世界革命纪元的终结,以及我们现在所知的全球化的晨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的解放运动,在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中产阶级领导下,以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的名义抛弃了他们的殖民主义统治者。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将穷苦百姓的需求引导到这些目标上,利用民怨建立自己的政权。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就需在来自底层的激进压力和外部全球市场力量之间进行笨拙的平衡。绝对的国际主义潮流,支持了这些运动,尊重它们对政府自治的要求,认为它们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重大打

击。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倡导这些民族主义潮流的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精英几乎不抱幻想。不像更加多愁善感的种种后殖民主义,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第三世界”就是好,而“第一世界”就是坏。相反,他们坚持对繁多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政治本身进行阶级分析。

① 孤立无援,贫困不堪,缺乏民政、自由和民主的传统,一些这样的政权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使得自己形单影只。另一些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独立自主,一旦政治主权未能带来真正的经济自治,而且在西方统治世界时,永远无法取得经济自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不断加深,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滞胀和腐败中越陷越深,艰难时世中的西方资本主义那咄咄逼人的重建终于终结了民族—革命独立的幻想。“第三世界主义”因而也让位于“后殖民主义”。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出版的皇皇大著《东方学》,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措辞方面的这种转折,尽管作者对随之而来的大部分后殖民主义理论抱有可以理解的理解的保留。这本书正是在全球左派时运发生逆转之际问世的。

② 鉴于民族革命在所谓的第三世界部分失败了,后殖民理论对所有民族性的谈论都小心翼翼。有些不是太年轻就是太愚钝的理论家,记不起民族主义在当时就是一支效力惊人的反殖民力量,发现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愚昧无知的沙文主义或是种族至上主义。相反,许多后殖民思想深入讨论了世界主义的方方面面,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后殖民国家正被无情地吸入到全球资本的轨迹中。在这一进程中,后殖民理论反映了真正的现实。但是因为摒弃了民族性的观点,它也倾向于抛弃阶级的观念,后者曾与民族革命结下不解

之缘。大多数新理论家不仅仅是“后”殖民主义，而且还是原先使新国家诞生的“后”革命动力。如果那些民族国家部分失败了，无法与富裕的资本主义世界友好相处，那么超越民族似乎也意味着超越阶级——而这正发生在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强大，更具有掠夺性之时。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自己确曾超越了阶级。他们唤起全国民众，调和阶级利益的冲突，促成虚假的团结。中产阶级从民族独立中所得利益比处境困难的工人农民要多，后者只不过发现自己面临的不再是外国剥削者，而是本国剥削者而已。即使这样，此种联合也不是完全假冒的。如果民族的观念可以代替阶级冲突，这种观念同样决定了阶级冲突的形式。如果民族观培育出一些危险的幻觉，它也有助于彻底改变这个世界。革命的民族主义确实是 20 世纪最为成功的激进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的不同群体和阶层确实面对一个共同的西方对手。民族早就是与这个对手进行阶级斗争所呈现的主要形式。民族，毫无疑问，是个狭隘、扭曲的形式，最终将证明为是不恰当的形式。《共产党宣言》认为，阶级斗争首先采用民族斗争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大大超越了这种形式。正因如此，民族是团结不同社会阶层——农民、学人、知识分子——与阻挡他们独立的殖民势力进行斗争的方法。而且，至少是在开始之时，它还有一个有利于它的强大论据：成功。

对比之下，有些新理论，认为自己将注意力从阶级转移到了殖民主义上——似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本身是与阶级无关的问题。从欧洲中心论来看，这些新理论认为阶级冲突只发生于西方，

或者仅以民族的观点来考虑阶级斗争。相比之下,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反抗殖民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它代表着对国际资本力量的打击,而国际资本力量则以持久的武力迅速对这种挑战做出反应。这是一场西方资本和世界上劳苦工人间的战斗。但因为这种阶级冲突是用民族措辞表达,因而为后期的后殖民论著中阶级观念的不断萎缩铺平道路。这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将在以后看到,20世纪中叶激进思想的高点也是他们下行曲线的起始点。¹²

许多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心从阶级和民族转到了种族。这其中意味着,后殖民文化的特殊问题老是错误地被归类于与其大相径庭的西方“身份政治”的问题。因为种族主要的是文化事务,注意力也就从政治挪到了文化。在某些方面,这两点反映了世界真正的变化,但它将后殖民主义非政治化并夸大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这样做与西方本身新的后革命气候非常协调。“政治解放”(liberation)不再流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emancipation)听起来古怪背时。看来,西方左派在国内碰壁之后,在国外寻找跳顿足爵士舞的地盘。^{*}然而,在国外旅行时,它行囊里装的却是西方蓬勃兴起的对文化的迷恋。

即使这样,第三世界革命也以自己的方式证实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西方劳工运动的战斗行为也是异曲同工。20世纪70年代西方工人运动在推翻英国政府时推波助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结束越南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近来大多数的文化理论对所有这些鲜有追忆。从文化理论

* 原文 stomping ground 意思是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译注